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社會心態演變

從 20 世紀 80 年代改革開放至 2000 年,中國人的社會心態總體呈現為對未來抱有樂觀主義的積極態勢。2000 年後,尤其 2008 年後,社會心態中的 負面感受增多,在我看來,2008 年北京奧運會可作為判斷社會心態演變的一個節點。也許是過去忽略了某些東西, 很多負面的社會心態我們此前並沒有明顯意識 到,而現在一下子感觸良深,深為所困,所以醞釀出一種整體性的認識:負面社會心態危機蔓延。

最近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很多人在回憶上個世紀 80 年代改革開放起步階段,那時儘管經濟、個人生活條件並不富裕,但大家都沉浸在相對輕鬆愉悅、對未來理想憧憬的氛圍中;並且由於當時對文化大革命已進行了深刻反思和批判,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鎖砸碎,所以說那個年代令人懷念和向往。

上個世紀 90 年代的基本心態相對平和。鄧小平同志南巡帶來了中國經濟的高漲,所有人都在追逐物質生活條件的改善,沒有停下來,靜下心來感受社會心態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無論是生活條件改善的人群(先富起來的人),還是改善相對少的人群都沉浸在追逐之中,對於追逐帶來的後果和差異,沒有直觀感受。大家處於“瞎忙”的狀態,甚至還樂此不疲,對於階層之間的對立和矛盾尚未有所感知,所以總體來說社會心態惡化還未出現。

2000 年後,問題開始嚴重。一方面,中國社會發生巨大變化,變化帶來的階層間差異為人們所感知。草根階層不滿情緒開始蔓延,對中產階級,尤其對精英階層(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的憎恨開始日漸增多。

2004 年,不和諧之聲初現,中國開始提倡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但那時國家致力於 2008 年奧運會的召開,當時許多社會心理學專家一致認為中國社會基本情緒的基調是積極的、向上的。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一洗百年來中華民族屈辱,為中國帶來的機遇有目共睹,對於國家凝聚力和國際形象提陞有相當大的幫助。值得注意的是,2008 年全球經濟危機中,中國政府 4 萬億一攬子計劃,讓世人感受到了風景這邊獨好,整個社會心態的消極部分被遮蔽。總體上,人們都未 嚴肅意識到中國社會心態的危機和負面情緒悄無聲息的蔓延。

2008 年北京奧運會成功舉辦的喜悅過後,各種不正常社會心理逐漸增多,社會心理學家開始意識到社會矛盾的出現,並指出中國社會心理開始出現消極的心 態,比如浮躁、喧囂、忽悠、炒作、炫富、裝窮、暴力、冷漠。整個中國社會心態的現狀,或者說 30 年的演變過程大概就是這樣。

中國人過去保守,不願接受新事物,在今天社會流動的帶動下,對他人、他文化的接受已極大改善;對於個人生活失意變得比較平和,前提是未受到不公平待遇,確實是自己能力有限;關於競爭意識,敢為人先的意識是 30 多年改革開放帶來的。改革開放讓中國人的社會心態發生變化,前 20 年更多是積極,而後 10 年消極增多。

時不我待:個體病態到社會病態演變原因

從過去某些個體病態到現在的社會病態趨勢的演變,有其社會深層原因。拿焦慮這種社會心態來思考,我們發現,中國現在是“恐慢”:趕超別人,以不被別人趕超為邏輯。事實上,從 1840 年西方列強靠船堅利炮打開中國國門之後,中

國人的焦慮就開始了,因為我們開始發現我們不如別人。梁啟超、李鴻章、孫中山都是這種心理,要改造中國,時不我待;毛澤東時代,中國革命的勝利一方面改變中國歷史的走向,另一方面加深了領導人的焦慮,因為他要向中國人民證明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是正確的。因此要趕英超



美,“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人何時會焦慮?那就是危機的出現。危機有兩種,一種是通過努力和奮鬥,會化解危機;第二種是已經看到結局,個人能力有限不能化解危機,就只能消極等待。改革開放最成功的地方是調動了所有人的積極性。但與此同時,與個人利益捆綁在一起的個人壓力,和唯恐被人拉下的焦慮開始傳導到其他人身上。

除焦慮外,現在社會還有很多病態心理,但很多社會病態相互之間很難區分。焦慮和浮躁可以分開,但實際上,浮躁和焦慮又有關聯。有些病態心理之間的含義讓最嚴格的社會心理學家也很難區分和界定。多與寡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讓社會心理變得積極和健康。從國家層面來看,國家和公眾,以及社會媒介開始對心態失序高度關注。國家將培育社會心態寫進“十二五”規劃,人民日報更是以《“心態培育”,執政者的一道考題》為題發表了關注社會心態的系列文章,所以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必須意識到的一點是,中國社會的消極心態是伴隨着巨大的社會轉型出現的,這是社會轉型的伴生物。從這一角度來講,造成這些病態的深層次原因就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其一,社會轉型的速度太快,使得我們對生活改變的期望值越來越高。以個人住房的平米數來看,一些人在十年內完成了從 50 平米到 100 平米的轉變,甚至期待更寬敞的居住空間。社會變遷速度的加快使得我們降低了對獲得改善的滿意度,同時提陞了我們的期望值,眼光越來越高,不滿卻越來越深。

其二,改革紅利的不均衡性。先富共富的初衷是:一部分先富,帶動不發達不富裕實現普遍的富裕。儘管可能存在焦慮、物欲、拜金,但是沒有仇富、暴力。為何有病態心理的出現?原因就是 在改革開放 30 多年中,人和人、群體和群體間的差異被拉大。富裕起來的人(剛富起來的“一代”),對獲得的財富非常看重,有顯擺的心態。

其三,社會發展形態的不同。相比歐美國家,歐美老派資產階級也會有炫富,但在公眾場合反而比較低調。他們沒有身份的焦慮感,很悠然、很從容。他既沒有要追趕別人的動機,也沒有怕被別人趕上的焦慮。我認為這是社會發展的形態不同造成的,中國正在向現代化邁進,而歐洲已到達後現代社會。美國社會學專家英格

爾哈特認為只有我們真正佔有物質後,才能生出超越物質的概念。革命中能夠捨命的人往往並不是物質匱乏的人,比如俄國的十二月黨人是俄國的貴族。正是因為對物質沒有焦慮,所以才能操縱對物質失去的恐懼。

其四,生活態度的不同。西方發達國家的人在很多生活態度上比我們積極、從容,沒有不安和焦慮。

我們的教育必須改變,否則,中國人會成為世界上最物欲、沒有精神追求的人群

我們只是剛剛得到富裕,所以說“貴族經歷三代才可以從容應對”。因而一方面我們要接受三代現實,另一方面我們要重視消極社會心態,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非常重要。怎樣把價值觀中積極健康的心態傳遞給人民,尤其是年輕一代?我認為我們的教育必須改變。否則,中國人會成為世界上最物欲、沒有精神追求的人群。路透社與艾普索斯民調公司在 2010 年發佈的一項世界上 23 個國家對金錢態度的調查結果顯示:中國第一。其中你認為金錢是否能改變一切?中國佔 66%,美國人只有 33%。該調查的結論是:看來東亞國家對物質的看重強於歐美國家;發展中國家對物質的看重強於發達國家;不幸的是,中國又是東亞社會,又是發展中國家,所以中國是第一。如果

當今中國人的禮尚往來



在今天,中國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已經進入了一個冷淡期。縱然是親戚,彼此間的關切也日益減少,算計越來越多。親兄弟姐妹之間,為了一點點的利益糾紛,當眾吵架,甚至大打出手者已成家常便飯。但奇怪的是,人際關係冷淡了,人情往來的錢財耗費卻大了。過個年,好多人感慨,一個年過下來,單紅包一項,就得幾千元。其實,紅包還是小意思,如果趕上朋友婚喪嫁娶,過生日,孩子白天之類的事情,人情禮送得讓人肉痛。好些白領哀嘆,掙了一年的錢,光送禮就給送沒了。

送禮送的肉痛,沒有人能利住送禮風,為了想辦法多撈人情錢,大家就挖空心思搞名堂。婚喪嫁娶自不必說了,但凡辦事,就把陳年

我們不改變,不重視精神的改造,中國社會的變革和轉型就不會對人類做出精神上的貢獻,只能是 GDP 的堆積。

200 年前的歐洲同樣經歷社會轉型,但有兩個方面沒有我們表現得嚴重。首先,現代化程度是不同的。他們的現代化是原生的,當他們在邁向物質豐裕的過程中,沒有更富裕的榜樣在前面,不需要趕,他們沒有趕的心態。我們處於起步狀態,趕的焦慮會比別人多。第二,整個西方世界的變遷不同。無論是歐洲、美國、日本都已經完成變遷,最大規模的變遷涉及到的人口分別是 3 億、3 億、1 億,而中國是 13 億。因此,在中國社會失衡大一點,性質嚴重一點,是可以理解的。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最早意識到社會心態危機,他在 1993 年香港中文大學作了題為《中國城鄉道路發展》的演講,首次提出在對生態秩序研究之外,社會學應該研究 心態秩序。他當時提出,中國人能否做到“安其所,遂其生”?必須要意識到整個社會轉型帶來原有社會秩序的猛烈衝擊,以及心態危機。

中國社會只要繼續沿着現代化道路前進,大體實現現代化,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實現相對的公平,我們很多消極的社會心態,如焦慮、浮躁就能夠得到更好解決,實現費孝通先生的“安其所,遂其生”,我們才能解決精神上漂的問題。

(作者周曉虹為南京大學社會學院院長、博導、中國社會學會常務理事;人民論壇記者高驥採訪整理)

老眼對翻出來,凡是曾經送過禮的人,都給送請帖去,還讓人家家來還禮。沒有送過的,只要相識,也發帖過去,多一份算一份。自己生日辦酒,老婆生日辦酒,孩子滿月,生日都辦酒,最後擴大到但凡有點動靜,有個說法,就辦酒,清客不是為了吃飯,而是撈禮金。當然,你這樣辦,別人也這樣辦,互相攀比,水漲船高。大家就這樣沉湎在各種人情酒席之間,不斷掏腰包,今天你掏我的,明天我掏你的。折算下來,最後誰都沒掙到,只是便宜了酒樓飯館。名副其實地勞民傷財,但無論如何都刹不了車。

更有意思的是,這樣的人情往來,沒有讓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加深,反而令彼此的感情更糟,吃來吃去,送來送去,你討厭我,我討厭你,一個個都跟鳥眼雞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原來關係不錯的親朋好友,就這樣愈演愈烈的人情往來中,變得勢同水火了。

禮尚往來,是國人的傳統。往來的禮,當然有金錢和物質的成分,但對於古人來說,所謂的禮,更多的是禮儀,所送的那份禮,也更多的具有象徵性意義。大筆的金錢,如果作為禮來說,一般都用在賄賂上,並非一般意義上的人情往來。彼此送禮分量加重,從本質上講,恰是國人人際關係惡化的表現。有人帶頭,把辦事請酒變成撈禮金的機會,辦一次,就能撈一大筆錢。被撈的人,氣不過,“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幾番反復,就造成了今天禮金氾濫的局面。這樣的局面,人人在局中,人人不痛快,但卻欲罷不能。人情往來越是密集,浪費就越大,這樣弄下去,很多人都吃不消。

對於吃不消的事,理性的人就應該有能力不做。不做,無關人情,做了,人情反而薄。明白了這個道理,豁出去,第一次不做了,以後就好辦了。久而久之,關係就理順了。理順之後的人情,才是真正的人情。

國家公祭日:在紀念中凝聚圓夢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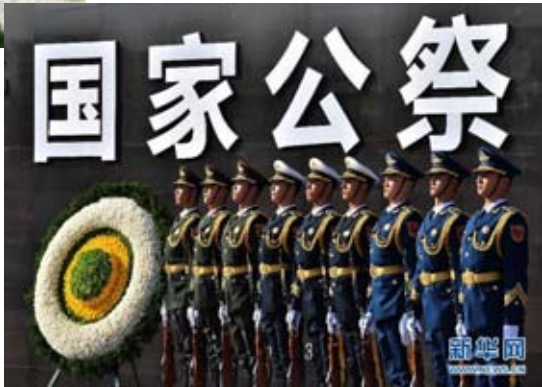


12 月 13 日是首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上午 10 時,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儀式上發表講話時強調,歷史不會因時代變遷而改變,事實也不會因巧舌抵賴而消失;南京大屠殺慘案鐵證如山、不容篡改。

七十七年前,日本侵略者悍然攻佔中國首都南京,血腥屠殺 30 多萬中國人,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事件,成為中華民族永遠的傷痛。而今我們設立國家公祭日,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國家公祭儀式,體現出一種國家意志和尊嚴,其意義不僅僅在於讓國民銘記歷史,更彰顯出一個國家對生命的敬畏,警醒着人民莫讓歷史輪回,進而凝聚起國家和民族的信念和力量。

牢記歷史,奮發圖強。回望那段慘痛歷史,我們更加深刻地明白了一個道理,即落後就要

挨打。日本之所以敢於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進而血腥屠殺我同胞,所倚仗的無非就是當時明顯強於中國的軍事及科技等優勢。歷史不會因時代變遷而湮沒,而今再次審視這段歷史,我



們更應在黨的領導下奮發圖強。也唯有在經濟、軍事、科技等方面夯實自己,才能挺直腰桿不再受欺負。

團結一致,共御強虜。當時中國軍閥割據內戰不斷,呈現出一盤散沙的局面,遂導致日本侵略者趁虛而入。毛澤東在《論持久戰》就曾明確指出,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就在于

中國民衆的無組織狀態。而南京大屠殺等慘痛的教訓,最終也讓中國人民覺醒起來,爭取全國大團結的人越來越多。從一盤散沙內戰不斷到萬眾一心共赴國難,中華民族已經逐步挺直了腰桿。

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在目前紛紜複雜的國際形勢下,日本右翼勢力也活動猖獗。其非但沒有正視日本侵略為整個世界帶來慘痛後果的那段歷史,反而不顧亞洲鄰國的抗議和反對,幻想着通過教科書事件和修改戰後日本憲法等為軍國主義招魂,最近甚至還悍然解禁集體自衛權,這樁條件都足以倒逼着我們要擦亮眼睛,在銘記慘痛歷史的同時保持對日本軍國主義的足夠警惕。

殷憂啟聖,多難興邦。歷史的恥辱是對昨日的慘痛記憶,更是今日我們前行奮進的不竭動力。先前習近平總書記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就曾強調,中華民族的昨天可以說是“雄關漫道真如鐵”。公祭這天向 30 萬亡靈敬獻的

八只花圈,就猶如八個記憶的沙漏,向人們訴說着近代中國那段漫長、黑暗、令人心痛的歷史,提醒着後人要記住民族創傷,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警鐘必須長鳴,國耻務必銘記。國家公祭拉近了遠去的硝烟,重溫了民族的苦難,也讓我們再次感受到了奮發圖強團結一致提高警惕的緊迫與必要。而今南京大屠殺慘案鐵證如山,面對日本右翼分子企圖否認慘案的卑鄙伎倆,我們在擦亮眼睛提高警惕之餘,更應緊緊地團結在黨中央周圍,不斷增強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以實實在在的行動來捍衛民族尊嚴並凝聚圓夢動力。

